

《楚辞》研究（上）

河南大学学人文丛

孙作云文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楚辞》研究(上)

河南大学学人文丛

孙作云文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る 坂 下 の 支 那 印 付 印 子 以

孫作堂

[illegible]

第
頁

10 x 24

序

史树青

吾友孙君心一哀集其父雨庵先生遗著《〈楚辞〉研究》、《〈诗经〉研究》、《神话传说》、《民俗与美术考古》共四卷，汇为《孙作云文集》，将付剞劂，以余与雨庵交谊甚笃，且一度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旧学商量，新知学习，知之较深，爰为撰序。

余谓雨庵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逝前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为我国学术界卓有成就的学者。数十年来致力于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历史、考古、文学及神话传说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盖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深受闻一多先生熏陶，掌握了闻先生的治学方法，尤其对闻先生的楚辞学心悦诚服，所以雨庵对楚文化的研究既是多年从事的专门课题，也是他所获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在雨庵先生勤奋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二百余篇（部）学术论文（著），其中有关《楚辞》的论文（著）约占四分之一，如早年所著《〈九歌〉山鬼考》、《〈九歌〉司命神考》、《〈九歌〉非民歌说》、《〈九歌〉东君考》、《〈九歌〉湘神考》、《〈离骚〉正文的推测——〈离骚〉文意与文貌之复原》等，数量是很多的。他晚年完成的《〈天问〉研究》只是《楚辞》研究的一部分。

1975年2月，雨庵在给我们的信中说：“因注《天问》，专心致志，苦思冥想，思与屈原神会。”又说：“先整理错简，连带校正错字，其次再加以注释（注音、释字，说明错简原因），再次是翻译（译意），再次

是前言,最后是考古插图,书名是《〈天问〉新解》或《〈天问〉研究》,完全是我孤军奋战,苦得很,每解决一个问题,也有‘误书思适’之乐。我很想把屈原所见楚宗庙壁画,恢复一部分(不可能全恢复,亦无此必要),大约可以找到三十张图,使考古材料与《天问》相印证。”

雨庵先生从事《诗经》的研究,是与楚文化研究有很深的联系的。他以《诗经》为基础,得出了西周是封建社会的结论,认为这个问题不明,其他上古史的许多问题皆无从着手,所以使周代社会的研究扩大了领域,为我国学术界所关心的古代史分期问题树立了一家之言。所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收入了大部分论文,对《诗经》文字的解释和编排,结合周史,提出了许多与人不同的见解,我认为都是新义。昔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今雨庵先生《诗经研究》一出,真可以说是“雅颂各得其所”了。惜十五国风无楚风,遂把《楚辞》视为楚风,将书斋取名“楚风堂”,以示自己毕生研究《楚辞》和《诗经》的志向。

1976年,雨庵先生制定了新的规模庞大的研究规划,准备在修订旧作的基础上,不只是研究楚文化,而是与教学相结合,对我国古代社会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他曾给我写信谈到这项规划的简单内容:

一、写《屈原传》,对于屈原本人及作品(写作背景及年代)虽已有初稿,还要补充提高。努力方向在研究战国史地及战国考古发现情况。

二、写《屈原的抒情诗》及《屈原的祭神歌》二书,已有论文十几篇,再重新整理,并注释文字,在《屈原传》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其作品。

三、写《古器物图像与神话传说的关系》(或名《器物图像与神话传说研究》),已有《蚩尤考》、《饕餮考》、《羽人考》、《飞廉考》、《敦煌画中的神怪画》、《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马王堆出土帛画》、《密县打虎亭东汉画像石墓墓门画像》、《长沙战国帛画》(二种)、《龟蛇画像》、《天问图》等。以此为契机,重新研究从原始氏族到国家这一段历史。1978~1980年写出一

本《论夏代文化》小册子,先看《战国策》,以后再看先秦诸子,每看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但时间总是不够用,加之读书太少,知道的东西太少,悔不当初,玩忽岁月,太不用功。中国的旧学问懂得的人越来越少,如何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文化之的?偶尔查查标点本史书,觉得有许多不对,由此可见,研究学问非下苦功夫不可。

这是雨庵先生晚年的学术研究规划和治学的深刻体会,语重心长,出于肺腑,虽然他的规划未尽完成,但经心一遵照规划进行整理,除《〈楚辞〉研究》、《〈诗经〉研究》以外,还有《神话传说》、《民俗与美术考古》各一卷,基本合于规划的原意。至于他的治学经验,经常现身说法,勉励后学,不但对校内的同学讲,还对向他请教的同志、朋友讲,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态度虚心诚恳,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赞扬。

从雨庵先生的一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把楚文化研究当做毕生的事业,始终不懈地努力探索,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他紧紧追步于闻一多先生之后,既继承了前人的已有成果,又时时在开辟新的途径,不断地把学术研究推进到更高的水平。就这一点来说,雨庵先生在我国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中,不失为承前启后的一位。

西周重器青铜天亡簋(大丰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来都认为是西周建立后第一件铸有西周历史的青铜器,经雨庵先生研究,铭文中“不(丕)克气(讫)衣(殷)王祀”句,遂定为武王灭商以前的铜器,并论“天亡”即武王的太史“史佚”,这种论点是可信的,因此否定了一些人对灭商以前周人无铜器的说法,进一步证明了周人灭商以前的文化成就,由此可以看出雨庵先生结合实物研究古史的贡献。

雨庵先生关于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和民俗美术的研究,也探迹索引,穷本溯源,从图腾信仰到民间习俗,遵照科学态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

总观雨庵先生这部著作,对我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

件、神话传说、文物考古等大有“凿破浑沌”之功,于后学研究工作的启迪和教育既深且远,其书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

余因应心一之请,勉撰短序,重读雨庵诸作,愈觉其学术研究的博大精深,三复斯言,以当弁首。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史树青谨序

殚精竭虑 求索楚风

——孙作云先生传略

孙 心 一

孙作云先生(1912~1978),字雨庵,号龙举,汉族,辽宁省复县(今瓦房店市)人。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12年正月初六(公历2月23日)出生在一个已经富裕起来的家庭。父亲上过私塾,念过《四书》、《五经》,略懂中医之道。母亲葛氏,是位贤妻良母。1919年2月(7岁)就读本村小学。先生自幼聪慧,深得教师格外的青睐。1924年12月(12岁)小学毕业后,考入复州城内复县初级中学,1928年(16岁)考入沈阳东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从师于梁启雄先生(梁启超之弟)。梁先生的渊博知识和严谨治学态度,对先生影响甚深。由于发愤读书,刻苦勤奋,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先生立志做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之人,因此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希望将来做一位诗人。当时,先生曾担任附中校刊编辑。1931年7月(19岁),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大学附中,学校特准免试升入东北大学,然而先生却孑然一身来到上海,考入了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因战局急剧变化,先生返回老家。1932年4月与徐桂芳女士订婚。是年金秋,考入北京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跟随闻一多先生学“国文”,选修《楚辞》,教室在“清华学堂”旧大楼105号。在闻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第一篇学术论文《〈九歌·山鬼〉考》刊载在1936年《清华学报》上。在清华大学时曾担任《清华周刊》杂志的编委。1935年发表《论现代派诗》及许多新诗作品。

1936年(24岁)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天考入清华大学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导师仍是闻一多先生。这一时期,先生主要致力于《九歌》研究,发表的论文有《〈九歌〉司命神考》、《〈九歌〉湘神考》(此文为大学毕业论文)、《〈九歌〉非民歌说》,译有青木正儿《楚辞〈九歌〉之舞曲的结构》。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从《九歌》发轫的。古代的祭祀典礼与祭祀者的阶级地位相适应,《九歌》中的天神、地祇不是普通百姓所能祭祀的,于是先生提出《九歌》是楚国国家祀典的乐章,“这种学说成为《九歌》研究中影响很大的流派”(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先生沿着闻氏的治学途径,把《九歌》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争的阴云笼罩清华校园,9月底,先生重返故里。1938年7月又返回北京,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任编辑,从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历时三年有半,编成《经部·诗经类目录》、《史部·金石类目录》各一本,助编《子部·艺术类目录》一本,补定《史部·地理类·方志之属》东北县志数篇及《子部·艺术类·食谱之属及游戏之属》提要十余篇。

1941年秋,先生受聘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任讲师、副教授,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民俗学、《楚辞》、中国古代史课程。此时,除撰写《〈九歌〉东君考》(1941年)外,全部精力集中于史前史的研究,1941年前后主要著述有《释姪——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1939年,1957年重写时改名《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研究》(1940年)、《泰山之礼俗研究》(1941年,北京大学铅印本讲义)、《槃瓠考》(1942年)、《飞廉考——中国古代凤氏族研究》(1943年)、《后羿传说丛考——夏初蛇、鸟、猪、鳖四族之斗争》(1944年)、《鸟官考——中国古代鸟氏族诸酋长考补》(1946年)。“七考”多发前人所未发,用图腾崇拜去探索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底蕴,论证了蚩尤以蛇为图腾、商人以燕子(玄鸟)为图腾、周人以熊为图腾,指出我国古代史的“三代”是由三个氏族发展扩充而来的,对我国氏族社会的图腾制度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许多朋友戏谑地称先生谓“孙图腾”。先生从《九歌》研究漫延到神话传说、民俗的研究,不能不归功于学生

时代对《九歌》的探究。《九歌》是一组抒情诗,它所描写的许多神祇,既具有神话的研究价值,又与古代的祭祀典礼相关联,也具有民俗学的研究价值。因此,《九歌》的研究促进先生旁及神话传说和民俗学的开拓。此间,先生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出版的杂志任编辑,还曾在中学兼教国文课,聊补生活的困窘。

1946年至1949年,先生应聘在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东北大学、长白师范学院任中国文学系副教授,讲授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楚辞》、《诗经》、中国新文学研究等课程,同时担任沈阳博物院研究员,主编《历史与考古》、《国立沈阳博物院汇刊》,编辑出版《辽海引年集》(纪念金毓黻先生60寿辰的论文集),1948年随博物院到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

1946年至1948年间,先生继续从事神话传说、民俗和《楚辞》的研究工作,著有《说丹朱——中国古代鹤氏族研究》、《说高跷戏出于图腾跳舞》(1946年)、《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1947年),并在《东北民报》(沈阳)上连载《年前年后——从民俗学上考察年节》、《三月三起源》(1947年)、《〈离骚〉正文的推测——〈离骚〉文义与文貌之复原》(1948年)等。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先生即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1950年3月调进北京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工作,任设计员,承担中国通史展览的设计工作,提出在原始社会的陈列中应将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与图腾信仰作为辅助材料的设想。本年加入中国史学会,与张政烺、李光壁教授等发起创办《历史教学》杂志,任编委,1951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建国后最早的史学刊物之一。1952年应聘于新乡市的平原师范学院(今河南师范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课程。1956年院系调整后,执教于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历史文选、《诗经》选读等课程。先生渊博的知识,透彻的讲解,深受学生热爱,外系的学生常常挤进先生的讲堂听课。先生还担任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史学月刊》编委、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

解放后,除了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先生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新境界,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论文,如《从上官大夫夺稿说到屈原因〈离骚〉而得祸》(1952年)、《屈原在楚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1953年)、《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1954年)、《〈九歌〉的写作年代》(1956年)、《〈大招〉的作者及其写作年代》(1957年)、《读〈史记·屈原列传〉》(1959年)、《屈原的放逐问题》(1961年)、《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1961年)、《〈离骚〉的主要错简》(1962年)、《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惜颂〉、〈抽思〉及宋玉〈九辩〉的相互关系》(1962年)、《汉代司命神像的发现》(1963年)、《〈九歌〉与民歌的关系》(1963年)、《从〈天问〉看夏初建国史》(1978年)、《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编年》(1979年)、《论楚辞〈天问〉对于我国上古史研究的贡献》(1979年)、《说〈九歌·东皇太一〉为迎神曲》(1980年)、《屈原和河南》(1982年)、《秦〈诅楚文〉释要》(1982年)、《楚辞〈天问〉与楚宗庙壁画》(1983年)等二十余篇。四十多年来,楚文化始终是先生研究的主要课题,用力最勤,占全部论文约三分之一,是获得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自励,先生的书斋取名“楚风堂”,以示自己以《楚辞》和《诗经》为毕生研究的志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伊始,先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在险恶的条件下,仍孜孜不倦地拼力求索,毫不气馁。1974年盛夏,先生不顾溽暑之苦,着笔于四十年前就立意撰写的《〈天问〉研究》(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竟然不到一年功夫,25万言的《〈天问〉研究》便脱稿了。先生根据屈原的其他作品,根据历史事实,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对《天问》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多发前人所未发。在闻一多先生之前,向来无人认为《天问》有错简,闻先生只揭出“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一条,郭沫若先生只指出“伏匿穴处爰何云,寤过改更,我又何言”,但未及其他,而先生改正了今本《天问》顺序的三分之一,凡三十余句,把散落在夏、商、西周各代的错简整理出来,使问春

秋七章自然归成一组,各得其所,前后文义连贯,面目一新。先生对错简的整理,不仅有内证(屈原作品本身的证明),而且有考古学上的证明,即用徐州画像石、吉林辑安通沟壁画墓、山东武梁祠画像石的材料,为恢复问春秋七章提供了证据。对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则采用民俗学的方法进行剖析,如指出“伯禹腹鲧”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翁制的遗俗,揭开了众说纷纭的千秋疑案,为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做出贡献。先生撰《屈原传》(未刊稿)之后,决意沿着屈子所走过的路访古寻幽,考察山川风物,体验屈子的章句,然终成未能如愿之憾事。

《诗经》研究是先生获取重大成果的又一个领域。从50年代开始,史学界讨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先生以《诗经》为基础,旁证其他材料,从分析反映土地制度(公田与私田)和剥削形式的诗入手,说明西周从封建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嬗变历程,考证周人在原始社会以熊为图腾,从后稷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到公刘时代已进入阶级社会,文王之世已进入封建社会;又用民俗学的方法解析《诗经》,发现23首恋歌的奥秘,指出它们都与上巳节(三月三)祭祀高禘、祓禊的民间风俗有关;还从《大雅·桑柔》篇的探索中,证明了厉王奔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奴大起义所致。范文澜先生读到这篇文章后来信称此论“为西周封建论添一支援军”,又说“从《大雅·桑柔》篇找到证明,是一个新发现,我好久不在这个问题上用心,得读大著,觉得新鲜可喜。陈陈相因,了无新证言论,实厌见厌闻也。”先生把研究《诗经》的15篇论文结集于《〈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39万字,196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还发表了《〈诗经〉的史料价值》(1956年)、《从读史方面谈谈〈诗经〉的时代性地域性》(1957年)、《说幽在西周时代为北方军事重镇(兼论军监)》(1983年)等论文。

70年代,我国考古发掘出土许多汉代壁画墓、画像石墓,先生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和楚文化的雄厚功底,进而去探索它们的内涵,认为汉代人的主要迷信是升仙与打鬼。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有《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画幡考释》(1973年)、《长沙出土的汉墓帛画试释》(1973年)、《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1973年)、《洛阳西汉

壁画墓中的傩仪图》(1977年)、《洛阳卜千秋墓壁画考释》(1977年)、《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画像石墓雕像考释》(1978年)、《中国古代器物纹饰中所见的动植物》(1980年)、《洛阳西汉壁画墓考释》(1987年)等。1973年5月要在日本东京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画像石、碑帖拓片展览”,先生为河南省博物馆选展汉代画像石50幅拓片,并一一写出解说词。先生将画像石、壁画墓中的神怪画与古代的礼俗相融会,与神话传说相贯通,见解独到,发表相关文章约二十余篇。

先生为人耿正,性格开朗,幽默风趣,一生简朴,衣着无华,不饮酒吸烟,惟一的癖好是喜爱买书,虽生活困窘,仍节衣缩食,四处选购,留下许多书籍。凡先生读过的书,书眉行间无不留下批语,圈圈点点,红蓝各色批语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甚至连原文也淹没不清。先生在逝世前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心情并不愉快,有许多工作未作,有许多书未读,有许多文章未写,而转瞬六十六岁,行将七十,为之奈何!”翌日又订下“生活守约”七条,规定“每日至少看一篇文章,并作笔记”,“不浪费半天以上的时间”,并在“十年研究规划”中说:“两年内整理出夏史研究,写出中国人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中国国家出现史,为研究我国的阶级社会史作出贡献。”先生于1978年5月23日溘然辞世于河南开封市,终年66岁。生前仅留下专著两本,论文八十余篇及大量未发表、未整理的稿件,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目 录

序	史树青(1)
殚精竭虑 求索楚风	
——孙作云先生传略	孙心一(5)
屈原的生平及作品编年	(1)
读《史记·屈原列传》	(9)
屈原的无神论思想	(20)
屈原的放逐问题	(23)
屈原在楚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	(49)
从上官大夫的“夺稿”说到屈原因《离骚》而得祸	(58)
上官大夫与靳尚非一人考	(71)
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	(75)
屈原被人崇拜的历史条件	
——《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续篇	(87)
屈原传	(100)
屈原的故乡在哪里	(136)
屈原与河南	(138)
《楚辞》与上古史研究	(142)
《楚辞》——考古工作者如何利用这部书	(157)
《离骚》的主要错简	
——《离骚》文义的再探索	(162)

《离骚》校勘记	(190)
论《离骚》、《惜诵》、《抽思》、《九辩》的写作时间、作者与写作原因	(236)
《离骚》的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	
——纪念屈原殉国 2230 周年	(243)
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离骚》、《惜诵》、《抽思》、《九辩》的相互关系	(268)
《九歌》非民歌说	
——《九歌》与汉《郊祀歌》的比较	(286)
《九歌》和民歌的关系	
——从郑卫之音到楚声	(312)
秦《诅楚文》释要	
——兼论《九歌》的写作年代	(330)
论《国殇》及《九歌》的写作年代	(348)
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	(370)

屈原的生平及作品编年

要想了解屈原的作品,必须了解屈原的生平:他的出身、仕履、政治活动、政治思想;反之,若想了解屈原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屈原的思想,也应该了解屈原的作品。

那么我们就从屈原的生平谈起。

屈原姓屈(或者说以屈为“氏”,屈是春秋初年他的祖先的封地),名平,字原,笔名正则、灵均(见《离骚》),中国文人有笔名,大概是从他开始的。屈原是战国中期楚国人,约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死于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他死的年代,甚至于月、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人民已经把他的死日,当做节日来纪念他,这就是旧历的五月节或端午节。

他的一生,是和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同时的;在其他各国,就是和秦国的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齐国的齐宣王、齐湣王、齐襄王同时。在名人中,他比商鞅、孟轲、孙臧、庄周稍晚,和苏秦、张仪同时,而比荀况、公孙龙、邹衍稍早。从社会变化来讲,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正是各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从学术思想来讲,正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

屈原的家庭出身,是新兴地主阶级,虽然他的远祖是贵族,但到他的时代,已经和贵族挂不上边了。他是一位地主阶级的“贫士”,这有他自己的话和他学生的话可证。他在继《离骚》之后所作的《惜诵》中说: